

「香港戰後數學教育大事年表」整理後記

黃毅英

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

與列志佳先生編集「香港戰後數學教育大事年表」[1]後，深感香港數學教育的進展與世界性之「大氣候」及香港本身的「小氣候」息息相關。事實上當時亦將年表分作香港的數學教育、香港教育、國際數學教育與香港及國際動態四欄，供讀者比對之用。筆者以為，縱使今天，若要剖析香港數學教育之現狀，亦不得不從這些大、小氣候談起。

這個觀察，當時只在序文中略提，本文即欲作進一步之闡述，以便有興趣者可作更細緻的探討。當然教育社會學家會有更深入的分析，以下只道出一些筆者所觀察到的蛛絲馬跡而已。

百廢待興

「『新數學』運動的過程及對當代數學教育之啓示」[2]一文中已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百廢待興；上一代飽歷滄桑，艱苦的從頹垣敗瓦中嘗試恢復舊有秩序，而新生代在毫無故有束縛中又企圖建立屬於自己的新秩序。兩者產生著微妙的撞擊。其中表現在胡士託、反越戰、嬉皮士、學運的一連串運動上。在地球上另一邊（雖然兩者本質上截然不同）在中國大地上亦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文革展開，由紅衛兵宣告火紅年代的正式降臨。起碼在初期，頗有破舊立新之氣象，帶著換上新天新地之憧憬。中國大地之變化直接地、間接地引發了香港社會騷動。除了喚醒了一批由於國家動亂或自然災害「暫」避香江的過客重新認識自己中國人身份的意識外，亦驚醒了殖民政府不得不正視這個政治環境之改變。由是衍生一連串伴隨著種種安居樂業政策的本土意識。

暴動過後連續三屆（每兩年一屆：1969、1971、1973）之香港節之後，大家叫自己作「香港人」也許還是第一次。其他如十年房屋計劃、協助經濟起飛等政策陸續出籠。政府也從1966年天星小輪暴動中汲取了教訓，開始正視青少年和街童問題。在1966年暴動報告書中清楚表明要大力推動課餘活動和青年活動。馬會贊助暑期活動與其他組織如小童群益會、遊樂場協會等舉辦為宣洩青少年剩餘精力之活動如雨後春筍，亦可謂香港學校

課外活動全盛期之前奏 [3]。

社會轉型

如是香港進入接受殖民地政府、本土意識、中國身份認同三者若即若離之微妙拉扯關係。隨著「香港是我家」這種意識之增強，過客（無論希望內地局勢稍靖返鄉還是把香港只看作移民外國之跳板）的心態減弱，公民意識由是開始抬頭。大家開始關心自身的基本權益。同工同酬、中文運動等恐怕是在這個環境下應運而生。社會亦受到西方民主、開放的觀念所影響，加上一些官方媒體（早期是電台，後期延伸到電視台）的一些官民對話節目之設立，社會上對公平、自由、權益等等之訴求加強（到八十年代中期，甚至有所謂校政民主化之呼聲。「金禧事件」亦迫令有關當局不得不改革校董會等制度。嗣後一般學校均設立「校務委員會」進行所謂集體領導）。對不合理的事，民眾亦開始懂得去投訴、抗議、甚至遊行示威等。罷工、怠工、按章工作等，在以往，均是十分陌生的名詞。

大學學費資助制度促成了「大學平民化」，草根階層大學畢業後進入社會帶來深遠的影響，對公平、開放等渴求靜靜地起著革命。甚至有學者認為其中一批大學畢業生及後執起教鞭亦帶動了學校教育的轉型，課外活動在八十年代的蓬勃便是一個例證。[4]

權力下放

與此同時，殖民地政府已洞識了回歸乃不可逆轉事實之先機（據云於麥理浩時期已知道，只是秘而不宣），於是進行一系列政制改革，於社會上造就了積極的議政參政風氣，這與早期不准過問的氣氛可謂南轅北轍。

這亦不一定完全與政治因素有關。學校私營化、政府不應獨攬教育權似乎亦是西方世界的口號。課程發展委員會於一九七三年改組為課程發展議會便是其中的一個標誌：從以往由首席督學當主席變成由老師擔任，其他成員的代表性亦廣泛了。考試局亦於七十年代後期從教育司署分拆出來，其中委員會之組成亦十分廣泛。

在此之外，學校私營化、校政民主化等觀念亦一再得到提出。

全民教育

全民教育恐怕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事。就以學生行為問題而言，

所有青少年問題均變成學校問題，因為所有十五歲以下的青少年理論上都可以在學校裏找到。有關當局於是設立有本土特色又不涉及政治與宗教之學生團體，包括公益少年團和少年警訊等。與此同時，有關方面亦意識到隨著全民教育之推行，學校無可避免地要肩負更多的教育任務。由是一系列的課外活動指引（早期只為《課外活動參考資料》）、公民教育指引、性教育指引等等應運而生。此外還有環保教育、濫用藥物教育等等。這亦為將來「學科爆炸」與「課程統整」埋下伏線。

前線教育工伴者亦感到一些一般性問題如課室管理、訓導、輔導等迫在眉睫，遠超學科之教學，強化了自行為主義年代「通論」蓋過「個別」、「教育理論」蓋過「學科教學」之潮流。隨著一些自西方國家學「教育學」（包括課程論、教育心理學、教育測量學）本地學者之學成歸來，上述想法由課堂、學校、學術界一直延伸到教師教育。筆者以為、其中爭論至今依然繼續而可惜的是大家不傾向於審視問題正反的兩端（[2] 中亦曾作出討論）。

全民教育帶來了教師年青化 [5]，在新理念注入的帶動下，亦間接地孕育了專業團體之發展。以小學數學為例，普及教育引起了一連串的變革，包括升中試的取消、算術推廣為數學、由應試轉向數學的欣賞及著重數學在生活上的應用。活動教學亦應運而生，再加上十進制之推行，取締了大量不必要換算與化聚的計算 [6]，整個數學課程轉向動手學習與思考（「高層次思維能力」的一種表現）。一群以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數學組為主的小學數學教育工伴者在這種內部需要下，主動地迎接了這個轉型帶來的挑戰。在差不多同一時間，中學數學的專業化活動（以大學畢業同學會與香港數理教育學會為主）亦轉趨活躍，締造了一個專業團體的鼎盛時期 [7]。

在學界亦慢慢冒起了本土數學教育的凝聚力量。由外國學者將西方理論移植及香港學者於外地修業後把新的思維注入轉到包含了土生土長學者的及本地研究的局面。（筆者強調以上並非單向或互斥的進程）。如此種種均可標誌著屬於本地的「業界」開始落地生根。

回歸前奏

經過十數年的努力，普及教育所衍生以學習差異和行為乖異為主的種種問題並未有解決且有每況愈下之跡象。這正是教育統籌委員會第四號報

告書之主題而其中含藏了日後目標為本課程等具爭議性之建議 [8]。與此同時，隨著回歸日期之臨近，在大環境充滿變數的氣候下，一些教育決策（起碼在筆者所接觸的數學科而言）顯得有點停滯不前。例如推行了近十年的數學課程因整個學制未知會否改動而遲遲無法啓動其早應進行之檢討。移民潮亦增添了人事上之不穩定性。所謂「武林大會」的數學課程檢討聯席會便是由一群無意移居海外的數學教育工作者所策動而間接促成了後來的數學課程全面檢討 [9]。

回歸後之全面規劃

回歸後不少政策仍在發展中，理應按下不表。然整體規劃氣氛似乎轉濃。

事實上，自九十年代的不少措施如高級補充程度考試、目標為本課程、核心課程（後演變成剪裁課程）、基本能力測試、高層次思維能力等等均是跨學科規劃多於由數學內部需要作出發。

本文謹隨附近年各大教育舉措間脈絡之個人解讀，供讀者參考。

- [1] 黃毅英、列志佳（2001）。香港戰後數學教育大事年表。載黃毅英（編）《香港近半世紀漫漫「數教路」：從「新數學」談起》，115 – 143。香港：香港數學教育學會。
- [2] 黃毅英、黃家樂（2001）。「新數學」運動的過程及對當代數學教育之啓示。載黃毅英（編）《香港近半世紀漫漫「數教路」：從「新數學」談起》，9 – 111。香港：香港數學教育學會。
- [3] 陳德恆、馮以浚、郭偉祥（1994）。香港課外活動政策的探討。載陳德恆（編）《課外活動：香港課外活動主任會十週年文集》28 – 35。香港：廣角鏡出版社。
- [4] 馮以浚（2001）。香港課外活動發展我見。「課外活動主任證書課程」演講。27/9。
- [5] 黃毅英（1995）。普及教育期與後普及教育期的香港數學教育。載蕭文強（編）《香港數學教育的回顧與前瞻》，69 – 87。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 [6] 黃毅英（待刊）。香港數學教育實地觀察 II —— 無無謂謂聽書記。
- [7] 黃毅英（2000）。香港數學教育史系列：本港數學教育學會沿革（個人經歷） —— 賀《數學教育》第十期刊行。《數學教育》10期，2 – 7。
- [8] 黃毅英（1997）。數學科「目標為本課程」始末。載馮振業（1997）。《香港數學課程改革之路》，38 – 47。香港：香港數學教育學會。
- [9] 黃毅英（2000）。香港數學教育另類報告 2000 —— 山仍是山的課程改革。載梁興強（2000）。《香港數學教育研討會 2000 論文集》，90 – 99。

課程趨勢

